



上图：《我有一好处》
纸本 34cm x 249cm
1991年 浙江美术馆
收藏。

翘上去再弯下来，我按照他的意见刻了五张……五十年代，为了帮我理解齐白石，他还专门为我写了一篇小文章《一窝蜂》，只给我看的，没有发表过……”尽管经历了“文革”之后，黄永玉与汪曾祺发生了一些误会，使得曾经的好友最终走向冷淡。两位老朋友的几十年，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，以时而相似、时而不同的方式向前走着。但当年在上海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日子，已不可能重现。有意思的是，相交一辈子，汪曾祺并没有任何一幅黄永玉的作品，人家问起为什么不向好朋友要一幅，汪先生坦言：“我其实很想要一幅他的画。但我不好意思向他张口。他的画现在值钱了，我和人家要一幅，不就是人家的钱嘛？”黄永玉也曾回忆，晚年汪曾祺尽管也有几次主动来找我见面，但不知为何，所谈之话总有隔阂，无法尽言，令人唏嘘不已……两人晚年某些无法言明的尴尬与无奈，也于此可见。汪曾祺去世后，黄永玉百感交集：“他死了，这样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……要是他还活着，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，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。”在黄永玉心中，爱画懂画的汪曾祺分量很重很重，以至于自己无法下笔描述他们之间恩恩怨怨半辈子的深厚

情谊。

40岁左右时，汪曾祺曾有一段专门画画的日子。那是1960年8月下旬，在张家口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，他主要的“作品”是两套植物图谱，一套《中国马铃薯图谱》、一套《口蘑图谱》，一是淡水彩，一是钢笔画。对于《中国马铃薯图谱》，汪曾祺后来多次回忆，“每天一早蹬着露水，掐两丛马铃薯的花，两把叶子，插在玻璃杯里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。上午画花，下午画叶子——花到下午就蔫了。到马铃薯陆续成熟时，就画薯块，画完了，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，吃掉”。

后来他进入剧团从事戏曲剧本写作，知道他会画画的人很少。“偶尔送一两件给熟朋友。后来求字求画者渐多。大概求索者以为这是作家的字画，不同于书家画家之作，悬之室中，别有情趣耳，其实。都是不足观的。我写字画画，不暇研墨，只用墨汁。写完画完，也不洗砚盘色碟，连笔也不涮。下次再写，再画，加一点墨汁。”

喜欢汪曾祺的人都知道，这位可爱的老头儿写作之余有三样爱好：“写写字、画画画、做做菜，免得像一部写作机器从早写到晚。”他觉得，画画比起文字，更抒情，更

快乐。尤其是到了晚年，文思渐稀画思寄，更是离不开笔墨的宣泄与表达。正如汪曾祺在《七十抒怀》中写的：“书画萧余宿墨，文章淡淡忆儿时。”诗和画，是汪曾祺晚年的两大兴趣：“文章或有山林意，余事焉能作画师。宿墨残笔遗兴耳，更无闲空买胭脂。”他曾自谦：“我的画作为一个作家的画，还看得过去，要跻身画家行列，是会令画师齿冷的。”的确，汪曾祺没有经过中国画的专业训练，但画中却处处透着文人气息，笔墨极简，却趣味盎然。不仅他自己乐在其中，更把这种愉悦的心情也带给了身边的朋友以及读者。

画外之言有真意

在《自得其乐》一文中，汪曾祺这样写道：“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，是可以在画上题诗，可寄一时意兴，抒感慨，也可以发一点牢骚。”又说：“我的画画，更是遣兴而已……人活着，就得有点兴致。我不会下棋，不爱打扑克、打麻将，偶尔喝了两杯酒，一时兴起，便裁出一张宣纸，随意画两笔。所画多是‘芳春’——对生活的喜悦。”从汪曾祺的绘画内容来看，他更着重于花鸟草木等